



## 【人物小檔案】

出生年：1912年

學歷：日本中央大學學士、日本早稻田大學肄業、東京教育大學博士

經歷：南投縣文獻委員會委員、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組長、台灣省立博物館副研究員、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。

在早期台灣鄉間，有些廟宇也是神明為人看病的地方，人們如果生病，就會在藥箱的每一格前「卜杯」，以作為揀藥的依據。

「會不會太迷信了？」這可能是很多人最直接的反應，可是劉枝萬不這樣想，因為他知道，當時的人是窮到沒錢去看醫生。作為資深的民間信仰學者，在劉枝萬理性研究的背後，更多的是對台灣鄉土悲天憫人的胸懷。

# 台灣民俗學的奠基者 劉枝萬

從小接受日本教育，劉枝萬說，日本人很重視鄉土教育，認為這是愛國的基礎，這種觀念也影響了他。他從日本留學回台後，就一邊在家鄉埔里教書，一邊帶學生認識鄉土，尤其埔里的族群組成複雜，不但有清末遷居於此的平埔族，還有日治時期被治理的高山族，都是田野研究豐富的題材。

1950年代，劉枝萬受邀到台灣文獻委員會撰修南投縣縣志卻遇到難題，因為當時教育不普及，到鄉下訪問常被民眾排斥。幸而在他努力下克服困境，終於得到最珍貴的原始資料。相較於當時踏查的困境，現代的田野調查，雖因交通、資訊發達，不再難以進行，但地方色彩卻慢慢淡化，相似的城鎮也不再擁有自己的故事，劉枝萬深感惋惜。

劉枝萬著作以民間信仰為主，但他認為自己寫得最辛苦，也最有成就感的是《台灣中部碑文集》。他說：「鄉公所或廟宇常見的碑文，其實是記錄當地的第一手資料，訪查時卻發現，很多碑文都被居民當作『水溝蓋子』，非常可惜，於是開始尋找碑文。」他走遍中部各地，記錄下一百多塊石碑，

不但成為國內研究碑文的第一人，也喚起大家對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視。

1964年，由於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學研究所即將成立，負責籌備的凌純聲所長，上班經過松山媽祖廟，看到熱鬧的建醮儀式，覺得很有意思，就請劉枝萬作研究，也讓他從此踏進道教獨特的信仰世界裡。劉枝萬說，當時他接觸道教中負責作醮的紅頭道士，卻很難探聽到任何儀式和內容，很多珍貴資訊都是北部很有名的一位何姓道士主動提供的。早期日本人治理台灣時「興佛滅道」，道教曾受迫害，何道士看到政府最高學術機構著手研究，感到非常榮耀而願傾力相助。劉枝萬也強調，不要小看道士，他們可都是文武全才，作儀式時能翻筋斗，更寫得一手好書法。

田野調查時也必須入境隨俗，像是參加道教中最複雜的「建醮」儀式，有時因為是在郊外舉行，晚上就只能睡在田地上。最辛苦的還是做紀錄，因為每跟著師公做完一場法事，正要趁師公休息時間清楚細節，下一場卻又已經上陣。因此他每年只能「專攻」一個領域，等次年舉辦時，再作另一種儀式的紀

錄，如此慢慢完整建構出建醮的全貌。

會通神鬼的乩童和尪姨，也是民間信仰中重要的人物，不過大多不願接受訪談。為了作研究，劉枝萬只好以「諜對諜」的方式記錄：和對方聊天前，先在口袋中備好音機；有時則是帶太太一起去，除了讓對方鬆懈戒心，「太太也可以當錄音機」，記下自己遺漏的語句。有一回，他還情不自禁對乩童猛拍照，結果乩童提著刀，追得他和太太到處跑，就像卡通情節一樣，每想起來他就覺得好笑。

劉枝萬認為訪談也是一門學問，如果對方講話前後矛盾，不要當面質疑，而應改天再解決，以尊重為前提；正如同答應寄給受訪者的照片，他從不黃牛一樣，因為設身處地為對分著想，對方才會願意再接受訪問。「日本教師教過，在做田野調查時，要把自己當作『invisible man』，也就是『看不見的人』。」他笑說，也許正因為個頭較小，不會給人壓迫感，才會讓對方什麼都願意講，甚至得到第一手的資料吧。

看來，帶著一臉慈藹笑容的劉枝萬，不但是台灣民俗學的奠基者，也是一位豁達開朗、值得後輩效法的台灣研究學者。

## 台灣圖書館的故事⑤

文／劉屏

## 太田為三郎館長 建立目錄 豐富館藏

圖書目錄上的阿拉伯數字，就像每本書的身分證字號，讓讀者在茫茫書海中容易找到書本的「家」。對圖書館目錄編印樂此不疲的太田為三郎館長，在完成《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分類目錄》後，又進一步針對館方蒐藏的東南亞資料，發行《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所藏洋書目錄》。

這套西文圖書目錄涵蓋台灣、支那、法領印度支那（越南）、印度、暹羅、大洋洲、馬來半島、蘭領東印度、菲律賓群島等地圖書，以分類方式排列，每本書都包括著者、書名、出版日期、冊數及類號，卷末並附上作者姓名索引。《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所藏洋書目

錄》與《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分類目錄》的發行，改變了圖書館以買書序號進行分類的方式。

太田為三郎在目錄學投注的心血，對日本及台灣的圖書館都深具影響力。當時美國圖書館事業才剛開始成為一門獨立學科，東方國家幾乎完全欠缺以現代管理技能經營圖書館的經驗，曾擔任英語教師的太田為三郎憑著精湛的外語能力，引進美國麥威爾、杜威十進分類法以來的現代化圖書館經營技術，將圖書館藏書分為十門，十門之中分成十戶，每戶再分成十日，讀者按照類目檢索圖書，比過去更為便利。

太田為三郎對於圖書採購、贈送和徵集工作也非常積極，他將東南亞專書分成自然科學、人文科學兩大類，無論日文、漢文、洋文書籍都列入徵集範圍。該館草創階段的主要圖書來源，是以接收「私立台灣文庫」的藏書為基礎，太田為三郎升任館長後，透過岩波書店蒐集古書六千多冊，加上台灣總督府文書課的六千多冊，和新寄贈的圖書資料兩萬三千多冊；每年再固定編列預算採購圖書，使藏書突破七萬冊。對於無法蒐購的台灣文史資料，例如清代薛紹元編纂的《台灣通志》四十卷、《雲林採訪冊斗六堡》等，太田還雇人抄寫。

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歷任館長都非常重視台灣資料的蒐購，原因在於日本統治台灣以後，對台採取殖民政策，當時的總督府圖書館除了有啓迪民智的功能外，還肩負收集全台灣經濟資源、社會發展、民情風

俗的任務，以利政策的推行及統治。

當時，台灣分館對台灣資料收集有幾大原則：現有的資料不論報章雜誌或單行本，凡是有關台灣的，不論內容一律收藏；以進入日治時期以後的資料優先，再陸續往前推，收集清治時代、明鄭時代、西班牙與荷蘭時期的資料；歷任館長無不盡其所能的收集，一旦發現珍寶，可以買就買，買不到就抄，因此典藏日益豐富，成為全台灣藏書最多的公立圖書館。



太田為三郎館長讓人抄寫的《台灣通志》四十卷。（圖片提供／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）